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开发论 / 张敦富主编. — 北京 :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8

区域经济系列丛书 雪

ISBN 7-5019-3242-5

I. 西… II. 张… III. 西部大开发 索国 雪研究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5296 号

责任编辑 张玉勇

策划编辑 冷晓壮

责任终审 杜文勇

封面设计 张 颖

版式设计 智苏亚

责任校对 燕 杰

责任监印 崔 科

*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 6 号, 邮编 : 100740 雪

网 址 : <http://www.chlip.com.cn>

联系电话 : 010-65241695

印 刷 : 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张 : 13

字 数 : 326 千字 印数 : 1-3000

书 号 : ISBN 7-5019-3242-5/F·237

定 价 : 26.00 元

·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部分 西部开发的意义与历史

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陈栋生 (员)
西部大开发若干战略问题的思考	李善同 刘勇 (员)

第二部分 西部开发的基础与条件

中国地区经济格局演变分析	王青云 (猿)
中国西部省区的区域特征及优势分析	
摇摇	覃成林 侯林春 孙绍芳 (猿)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问题研究	
摇摇	张敦富 朱坚真 窦杰 (愿)
人力资源开发是西部开发的前提和保证	冯刚 (怨)

第三部分 西部开发的原理与原则

区域经济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	陈秀山 石碧华 (员)
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吴树林 叶裕民 (员)
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胡铁成 (员)

区域经济学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用	张敦富 (灵)
区域经济理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理论	孙久文 (灵)
西部开发的四个观点	胡兆量 (灵)
研究差异、认识差异、实施差异性对策	方磊摇孙玉莲 (灵)
西部开发的人口迁移对策研究	李玉江摇杨艳云摇李冠伟 (灵)
美国“西进运动”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摇摇	李丽萍摇李臣燕 (圆)
创新与西部地区开发	吴延涪摇吴国林 (圆)

第四部分摇西部开发的战略与运作

中国地区发展战略目标选择	李泊溪 (圆)
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选择	孙久文摇林勇 (圆)
西部资源开发启动战略	张敦富摇刘奇洪 (圆)
西部开发的运作机制	王海平摇李娟 (圆)
西部开发的产业选择	张可云摇余勤 (猿)
西部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及优化	
摇摇	张敦富摇朱坚真摇窦杰 (猿)
西部大开发中吸引外资的区域政策构想	付晓东 (猿)
西部大开发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侯景新 (猿)
西部大开发应重视城市人居环境建设	李丽萍 (猿)
联动解决各类区域病——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取向	
摇摇	张可云 (猿)
建立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加快西部经济开发	张国伍 (猿)
宁夏引黄灌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杜小华 (猿)

前摇摇言

摇摇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和当今国际国内形势，适当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全国上下、海内外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极大的关注。

西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占有十分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地位，加快西部发展已成为我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已行动起来，为西部开发献计献策，添砖加瓦，形成了我国西部开发的热潮。以区域经济研究为己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的师生们，会同有关学者，在以往多年区域经济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西部地区开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思想和建设性意见，现将部分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以表学者之心。

该论文集的主要内容涉及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和历史，开发的基础与条件，开发的原理与原则，开发的战略与运作等方面，有理论也有实践。论文集还精选了“西部大开发暨区域经济研讨会”上我国部分经济理论学界的著名学者精辟发言的内容。相信这些学者的观点、意见与建议，会激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并从中受益。

诚然，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自己对我国西部地区调查

研究不够，以及水平有限，无论文章撰写还是文稿，都会有欠缺甚至谬误，恳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诸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提供稿件，感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出的辛勤努力。

张敦富

圆园年 缘月

《区域经济系列丛书》

顾问委员会

主 任 陈 栋 生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磊 邬羽光 刘再兴 杨 吾 扬

张 国 伍 周 起 业 胡 序 威 胡 兆 量

郭 振 淮 魏 心 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张 敦 富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卫 平 叶 裕 民 孙 久 文 李 丽 萍

张 可 云 周 惠 珍 金 陵 侯 景 新

段 枚 焱

《区域经济系列丛书》

总摇摇序

《区域经济系列丛书》的面世，是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研究所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本所前辈学者长期以来的心愿。区域经济学专业及其前身——经济地理学专业和生产力布局学专业，曾在本专业创始人孙敬之教授及其后的刘再兴、周起业、杨树珍、郭振淮等教授的领导下，为国家培养了数百名高级专业人才，编写出版了在全国颇具影响的近百种专业论著、丛书和教材，完成了众多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为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在全国同行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也对世界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当时的国家形势和学科发展本身的原因，前辈们以本专业人员为主，编著出版一套专业丛书的愿望未能实现。今天，全所同志在现任所长张敦富教授领导下，继承前辈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从业精神，适时应势地开展《区域经济系列丛书》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对此，我们既感到快慰，同时也深感力不从心。快慰的是，我们正在继续前辈们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添砖加瓦；力不从心

的是，责任如此重大，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地着手编著《区域经济系列丛书》，主要是有了适时应势的国情条件。经过改革开放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引导与调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方经济主体得到确立，地方政府的责任、利益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前的那种中央高度集权、计划管理、排斥市场机制、区域经济利益被忽视或置于次要地位的状况已得到根本改观，“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步增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理论界和经济管理部门不仅参加并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大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计划等研究项目，写出了数以万计的考察、调研、论证、评价报告，而且结合我国地域广袤、地区社会经济差异大、情况纷繁复杂的国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与著述，出版和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可以说，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已步入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们全所同志在多年从事区域经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投入到丛书的撰写之中，及时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可谓“适时”。

区域经济不仅在一般的地区经济工作中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在国家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进程时，学科的研究工作及其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也受到极大的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五”计划》第一次专门列出了“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的篇章，提出了各类地区的产业布局方向；“七五”计划则进一步提出“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在迈向 21 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宏伟蓝图中，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在三大地带框架基础上提出了

七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由上可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愈发展，区域经济研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愈重要。不仅如此，当今世界经济在走向区域化、一体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急需加强国际区域经济研究。我们撰写这套丛书，也是顺应国内、国际的形势，正可谓“应势”。

丛书的撰写，是我所全体同仁适时应势肩负历史使命的集体活动。每一卷本的撰写，有的是全所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有的是几位同志合作研究的成果，更多的是个人长期从事某一领域教学与研究的专门著述。这套丛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对区域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第一个总结，今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总结，甚至更多。但这“第一个总结”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我们对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所做出的应有贡献，它必将促使我所的学科建设、专业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丛书的撰写，聘请了区域经济专业资深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他们对每卷书的撰写给予指导，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和意见，为《丛书》的撰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为了使《丛书》的编写更多地汲取既有研究成果与已积累之经验，参考了各部门、各单位的研究报告、论著和文章，有的未能一一标注，在此申明并向有关专家和作者深表谢意。本套《丛书》之所以能够比较顺畅地出版面世，除了所内全体同志的认真、勤恳、协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撰写出版如此大部头、多卷本的《区域经济系列丛书》（初步拟订 10 卷本）实属首次，我们尚缺乏经验。加之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作者水平所限，编写中难免失之偏颇，也会有疏漏、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区域经济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第一部分 西部开发的意义 与历史

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陈栋生

一、崎岖的历程

（一）旧中国的遗产

1949年以前，中国工业不仅规模小，工业门类残缺不全、技术水平低，而且在工业地区分布上也深深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90%以上的工业和近代交通设施偏集于东部沿海地带的几个城市。面积占全国1/3，人口占全国近1/2的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不到全国的1/10。“抗战”初期，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工厂西迁，西部工业曾一度短暂“繁荣”，即使在这个时期，西部地区大部分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在全国总量中所占份额都不到1%，如钢仅占1%，水泥仅占1%，纯碱不到1%，棉纺锭和织机1%，纸产量1%。^①而且

^① 刘再兴：《中国工业布局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重庆、昆明、贵阳、西安、兰州^①，少数城市和若干依托采矿兴起的矿业镇；除此以外的广大西部基本上是近代工业的空白地区，甚至连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的发展都很微弱，以当时人口和工业规模居大西北之首的陕西省为例，1955年，全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为 100 万吨，原油 10 万吨，棉布 10 亿米。印染布 10 亿米。在这个盛产棉花的省份，按人均分摊，每人才有 10 米机织印染布、10 多公斤煤。^② 这就是旧中国在西部留下的工业遗产。

（二）工业化起步的“一五”时期（1953—1957年）

参照前苏联工业化的模式，1953年，开始了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一五”时期，国家将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 15% 投入西部，156 项重点工程中近 100 项摆在西部（陕西省 10 项，甘肃省 10 项，西南地区 10 项），在西安—咸阳及其邻近地区新建了航空、兵器、电子、电力设备制造、棉纺织与印染等 156 个系列的数十个企业；在兰州新建了炼油、化工和石油化工机械等企业；在成都新建了航空、无缝钢管、量具刃具等企业；在新疆克拉玛依和阿尔泰地区分别新建了石油和有色金属采选企业，为西部地区第一批新兴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为创立西部工业发展的条件，国家投巨资修建了成渝、宝成、天兰、兰新等铁路，青藏与川藏等公路，重点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地质普查与勘探。

（三）“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958—1962年）

“二五”计划对西部工业建设原定的部署是“开展西南、西北和陕豫交界的三门峡地区分别以钢铁、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

① 据 1955 年《中国主要城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重庆等西部 156 个城市的工业企业数、企业员工数和企业动力设备容量，占全国城市工业总量的份额分别为 15%、15% 和 15%，参见陈栋生等著：《西部经济崛起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

② 李平安等：《陕西社会主义经济简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为中心的新基地建设；继续建设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工业。”^①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打乱了原定计划。为扭转“一五”时期发挥地方积极性不够的正确主张，在当时国内外复杂的大背景下，扭曲为不顾客观条件，追求建立地区完整工业体系，掀起了首先保“钢铁元帅升帐”的无数“全民大办”大、中、小型项目，这些项目遍地开花不结果。在随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绝大部分关、停。事实证明，三年“大跃进”，不仅未加快反而延误了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四）从战备出发的“三线”建设时期（1959—1966年）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备战出发，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集中力量“在‘三线’地区建设一个打不垮、打不乱的战略大后方”。^②西部的四川、贵州、陕西、甘肃、云南和青海六省都划入“三线”地区之列，特别是川、黔、陕三省成为“三线”中投资强度最高的地区，当时，采取准军事动员的方式，从东部沿海和东北、华北内迁项目，投资140亿元（1959—1966年累计数），围绕兵器、航空、航天、船舶和核武器等国防科技工业，新建或续扩建了包括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电子、能源等主要行业的近1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三线”建设除使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咸阳、兰州、银川、西宁等城市的工业门类增多，实力显著增强外，还在攀枝花、绵阳、德阳、江油、内江、自贡、乐山、眉山、宜宾、泸州、南充、遵义、都匀、凯里、安顺、六盘水、东川、易门、会泽、宝鸡、汉中、略阳、渭南、金堆城、天水、酒泉、金昌、白兰、陇西、庆阳、连城等形成了数十个新兴城市和生产科研基地。延续近三个五年计划期（“三五”、“四五”和

① 陈栋生等著：《西部经济崛起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② 林凌等：《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五五”前中期)的“三线”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发电装机容量新增 1500 万千瓦,煤炭年生产能力新增 1500 万吨,天然气 10 亿立方米,钢铁年生产能力新增 200 万 ~ 300 万吨,硫酸 150 万吨,烧碱 100 万吨,化肥近 100 万吨……^①与此同时,新建成昆、湘黔、贵昆、襄渝、焦枝、阳安等 15 条总长 1500 多万公里的铁路干线,使川滇黔三省之间和西部对外交通联系初步改善。可以说,“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生产力布局向内陆腹地规模与范围空前的一次大拓展,把西部工业化推上了新的平台。当然,这一基于备战,匆忙上马就赶上“文革”动乱,采取准军事动员甚至有违常规的大规模建设(如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设计无概算、施工无预算、竣工无决算;工厂布点“山、散、洞”等),其付出代价之大、遗留问题之多,亦和它的业绩同样明显与影响深远。

20 年代初中期,伴随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批以石油化工、冶金为主的重大成套项目,在全部 20 个项目中有 10 个建在西部,对提高西部工业结构层次和工业技术档次,影响深远。^②

(五) 快速发展的 20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发展的航向,使西部地区经济和全国一样步入了快车道,在百废待兴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农副食品、日用消费品和能源匮乏,如果说在东部大城市是多寡问题,而在西部,不要说农村,即使是工矿重镇和重点工程工地都是有无问题。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西部各省(区)首先着力运用当地资源,

① 林凌等:《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年。

② 陈锦华:《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充满信心》,载《经济日报》1999 年 10 月 15 日第 3 版。

大力发展农业、消费品工业和支农工业，缓解城乡市场供应的紧张。国家为了支持西部省（区）“提高日用工业品的自给水平”，在纺织品供需缺口大，长期依赖省外调入的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安排了近百万锭的棉纺能力；在新疆、内蒙古自治区扩建了毛纺能力，适应南方糖蔗、北方甜菜布局的西移，从“七五”起，云南、广西、宁夏、新疆的制糖业发展迅速，分别成为南北方新兴的制糖基地。为给国内合成洗涤剂发展建立坚实的原料基础，利用云南磷矿量丰质优新建了“云南五钠”。我国第一个彩管厂——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1980年代中期亦在陕西建成。为了支援农业，西部各省（区）普遍对六七十年代兴办的小化肥进行整顿提高、扩大规模。“六五”时期全国新建三个大化肥（年产合成氨100万吨、尿素100万吨）两个就配置在乌鲁木齐和银川。为了解决化肥供应结构中氮、磷、钾比例的失调，着力开发了云南、贵州和四川的磷矿，经过10年的发展，这些矿山已发展成从矿石采选到磷肥、磷酸盐类产品制备和出口的大型磷化工集团，在基础磷酸盐的国内市场中，三省已占1/3。在大西北，青海盐湖的开发利用资源从“六五”计划期起，连续扩建，现已发展成占全国钾肥产量1/3的大型基地。

西部是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能资源的主要蕴藏地，“六五”时期，西北重点扩建了陕西渭北煤田、宁夏的石咀山石炭井；西南进一步扩大对六盘水煤田的开发，并都相应配置了矿区电站。1980年代中期，能源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日益显露，“七五”、“八五”着手开发了陕蒙接壤的神（木）府（谷）与东胜煤田（三期工程，总规模达到年调出商品煤1.2亿吨）以及与之配套的电站；同时加大了西部水能开发力度，黄河上游的龙羊峡（120万千瓦）、李家峡（100万千瓦），长江干支流，红水河和澜沧江上的铜街子（100万千瓦）、鲁布革（120万千瓦）、天生桥一级（120万千瓦）、天生桥二级（120万千瓦）、漫湾（120万千瓦）和二滩（120万千瓦）等水电枢纽先后动工。到1980年代中后期，上

述工程先后竣工并网发电，不仅有力地支撑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还向两广等地输送了电能。利用地热和水能，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和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亦先后建成，为西藏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能源保证。与水、火电站建设相伴，西部富藏的有色与稀有金属矿得到了进一步开发。1949年来，贵州、青海、甘肃、陕西的铝工业，重庆的铝材加工业，甘肃金川的镍和铂族元素，云南的锡业与铜业，甘肃的有色金属冶炼与材料加工，青海、甘肃、川滇接壤地区和滇西的铅锌矿开采与冶炼都有长足发展，西部源个铅锌产区的崛起，将逐步接替辽、湘、粤等衰减中的老基地，成为我国铅锌金属的主产区。西部钢铁工业，以攀枝花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钢和酒泉钢铁公司几个大型企业为主和一批中型企业，通过技改，既扩大了规模，又增加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特别可喜的是，1949年代以来，新疆和陕甘宁地区石油、天然气勘探喜报频传，西北在扩建准噶尔、延长、柴达木和长庆等老油田的同时，新开发了远景储量可观的塔里木、吐（鲁番）、哈（密）和陕甘宁盆地的油气田，兴建了从陕甘宁至京、津和西安等城市的输气管道。西北地区的原油加工与石化工业相应发展，除通过技改扩建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还先后新建了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独山子乙烯工程、宁夏炼油厂、宁夏化工厂等，对新疆、宁夏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关联带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川气田的探明储量和产量亦大幅度提高，1949年代中期天然气外供商品量已占全国的将近一半。

近 1949年来，西部地区机械电子等投资品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和原“三线”建设项目的调整改造相结合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意味着原“三线”建设项目，从总体发展目标与定位（从战备转向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布局结构以至管理体制、企业形态等一系列根本性的调整。按照中央“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总方针，对 1949个“三线”单位采取搬迁或迁并方式，迁至邻近的大中城市；这些
远

单位在迁建时，凡根据市场导向与自身技术特长开发新产品的，随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① 有的调整建制，围绕市场急需的成套设备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如原分建在德阳、自贡、乐山几地的电机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等联合组建成“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成为我国大型水、火电站设备的重要研制基地，西安的有关企业，联合组建成“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在“七五”时期投资 10 亿元，引进先进设备，形成匹配 10 万千瓦发电能力的输变电设备生产能力（占全国 1/3），成为我国高压输变电设备的重要基地。大批军工企业利用国防科技优势，开发民品，在研制生产重大技术装备、重点工程配套设备、替代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和耐用消费品上都取得了不菲的业绩，有的发展成创出名牌产品、国人皆知的大型企业集团，如长虹（彩电）、嘉陵、建设（摩托车）、长安（微型车）、大唐（通讯设备）、彩虹（彩管），等等。为克服“三线”企业区位偏僻、信息不灵的不利条件，广泛采取了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开设“窗口”，获取信息和订单，依托母厂生产的方式，为新时期保存与发挥原“三线”企业的潜能趟出了路子，贵州振华电子集团是这方面突出的例证。

我国陆地边境线长达 2.2 万多公里，绝大部分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远离经济重心，使边境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梯次推进，1984 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伊宁、瑞丽等 5 个陆地边境口岸城市，批准辟建边境经济合作区；同时对所有内陆省（区）的省会城市开放。这使长期地处国内运输和市场网络末梢的沿边和省（区），一跃而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运输、多种类型的对外经济技术合

① 如原七机部在西南的几个企业，1984 年迁到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承担便携式地空导弹发射设备研制生产的同时，还开发出神州牌旅行车，12 种特种车等一系列民品，迅速成长为颇具市场活力的“云南航天工业总公司”，见《厂长经理日报》1988 年 11 月 10 日 粤版。